



□ 徐华亮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水塔”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截至2019年底，作为“水塔”的水源地保护取得了重要进展，累计4年以来全国县级以上的水源地基本上完成了清理整治任务，全国地表水的水质达标率提高了26个百分点。但是，水源保护区仍然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划定不清、边界不明、违法问题多见，环境风险隐患依然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必须从认识、管理、技术到机制上不断去完善和加以巩固。

增强水源地风险预见性，维护流域生态系统平衡。水源地保护作为污染防治七大攻坚战任务之一，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密切关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城市水质存在环境风险主要因为：一是水源地污染源多，管控难度大。相对于工业污染单一主体，整治收效明显，生活性污染源的相关者甚多，水源地保护管理具有客观上的难度；二是跨行政区的水源地保护问题仍较为突出，如上游区域直接排放污染物将影响到下游区域的水环境质量；三是区域地质环境导致地下水水质超标，并非人为污染。农村水质风险主要来源于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染。另外，农村旅游业兴起给水源地保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生态环境部在对县级水源地环境排查整治中发现，有的一级保护区水源地存在大量旅游开发活动，建有乡村旅游、餐饮娱乐等设施，餐厨废水经简易处理后就近排入坑塘或河涌，影响到水源地安全。

针对部分流域资源过度利用、水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失衡现象存在，生态环境部明确指出，要维护重点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自然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严格管控破坏珍稀、濒危、特有物种栖息地，超标排放污染物，开（围）垦、填埋、排干湿地等对水环境和水生生物造成重大影响的活动，切实保护重点流域水生

核心阅读

水源地环境质量，是保障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健康水的第一道关卡，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要全面整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环境问题，持续提高饮用水水源地风险防控和应急能力，提升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水平，不断改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切实保护好水源地。

生物的多样性。

实施水源地红线管控，努力实现“保”的目标。目前，我国水源地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要通过“划、立、治”等举措，实施红线管控，努力实现“保”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游要以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推进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对于水源上游涵养区，多林种、多树种，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增强水土保持、涵养优质水源能力。对于高风险区域，设置应急物资储备库及事故应急池等应急防护工程，临近水源地设置防撞护栏、节制闸、拦污坝、导流渠、调水沟渠，并在道路入口设立交通警示牌。对于一二级水源保护区，着重于隔离防护和岸道生态工程建设：按照先急后缓、重点突出的原则设置防护围栏隔离网，隔离工程原则上要沿水源保护区的边界建设；在水源地沿岸建设绿色长廊，构成绿化隔离带，维护河流良性生态系统，达到“水清、岸绿”的目标。同时，在生态红线范围内，要将一级水源保护区、二级水源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水源高风险管控区等划入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在红线区域实施最严格的资源环境保护、土地用途管制和产业退出制度，推动智慧监管，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由于我国许多地区供水系统较为单一，一旦发生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后果不堪设想，加强对我国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性污染事故的紧急处理已经

刻不容缓。加之部分水源地管理和保护涉及多部门监管，存在重复设置站点情况，以致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导致各部门之间监测数据不能共享，不能及时为饮用水安全提供保障。为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需要提高智慧化管理水平，加大自动监控能力建设力度。比如，长沙第二水源地株树桥水库大力推进饮用水源在线监测和在线监控，尤其对取水口实施了自动化监测，将COD、氨氮、总磷等7个指标纳入实时监测范围，然后通过水质环境自动监测系统将水质指标及时自动上传，增强了应急决策与处置能力、预警预防能力就是个好例证。

建立信息共享与监控预警平台，促进水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可以把地面和遥感测控数据放入共享平台，进行专业化数据分析与处理，然后向不同应用领域提供数据服务支撑。比如，被国务院确定纳入“十三五”期间分步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黔西北供水的重大任务，为实现跨区域水源地全方位、全天候、实时动态监测预警和指挥调度，建立了基于3S技术的集中式水源地监管信息系统。该系统是以“全过程智慧化监管”的理念为建设目标，能够分区域按重要程度定时定点进行常态化的遥感面向对象的译解和相关水质参数反馈监管，达到可视化展示效果和报警预测。

可以说，智慧监管实现了数据实时传输共享与生态安全报警，为水源地跨区域、跨部门监管提供了切实可操作途径，为加强排污口监督管理、

实施生态调度、水行政执法等提供了有力支撑，增强了应急处置能力，也极大促进了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让“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由于水源地保护的准公共物品特性，上游保护、下游受益的现象普遍存在，需要建立灵活的生态补偿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指出，要解决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优良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供给不足等矛盾和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近几年，有的地区对饮用水源区产业结构调整、清洁能源使用、农户宅基地退出、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等方面进行了生态扶持补偿，主要用于水源地生产生活扶持补助和产业发展补助。2018年，中央财政拿出721亿元，用于对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给予生态补偿。尽管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对水源地水质得到保持和改善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仍存在资金来源单一、使用不够精准、激励作用不强等突出问题，给政府带来沉重的包袱，未来需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让“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

总之，通过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污染物减排补偿、水资源节约补偿、碳排放权抵消补偿制度，合理界定和配置生态环境权利，健全交易平台，引导生态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积极稳妥发展生态产业，建立健全绿色标识、绿色采购、绿色金融、绿色利益分享机制，引导社会投资者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



（上接1版头条）

争当绿色发展样板。牢固树立“两山”理念，保持战略定力，决不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大、形势复杂挑战多，就开始动铺摊子上项目、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坚持把生态必须优先作为“红线”和第一位的要求，把发展必须绿色作为“底线”和最根本的出路，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链条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2019年，安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48.8%，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建设“两廊两屏一区”，构筑绿色江淮美好家园的生态屏障。

争当生态治理样板。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纵深推进“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全力推进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全面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2019年，安徽PM2.5平均浓度46微克/立方米，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16个市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50%，老百姓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长江流域国家断面水质优良比例85%，为国家考核以来最好水平。扎实推进巢湖新一轮综合治理和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高水平规划建设环巢湖湿地群、合肥骆岗中央公园、引江济淮沿线生态廊道等重大生态工程项目，巢湖水质由Ⅴ类好转为Ⅳ类，淮河干流水质持续保持优良。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开创全民参与“绿色+”时代，倡导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争当制度建设样板。围绕“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深做实河（湖）长制、林长制，拓展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推广“新安江模式”，启动建设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积极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全面构建智慧监管体系，建成投运省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完成2065家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安装、联网和运维监管。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既注重发展“高质量”，也追求生态“高颜值”，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聚焦“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安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三严三实”为标杆，以阜阳市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为镜鉴，以自我革命精神向顽瘴痼疾开刀，努力构建敢管敢治、严管严治、长管长治的党建新生态。

敢管敢治。从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去年以来先后组织开展“严规矩、强监督、转作风”专项行动，以“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展坚决斗争。

今年4月起，又以赵正永、张纪案为反面教材，集中3个月时间，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以“四联四增”为主要内容的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即联系剖析赵正永、张纪两面人两面派、不担当不作为、抓党的建设宽松软、抓落实不深入不到位的特点和表现，从政治、工作、管理、作风四个方面对照检视，切实增强“两个维护”的坚定性、勇于担当的斗争精神、干部教育监督的针对性实效性、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干精神。

严管严治。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留痕轻留心、重面子轻里子”等“八重八轻”突出表现，省委常委会形成检视报告，选取15个典型案例印发警示全省党员干部，围绕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问题整改，梳理出6方面18类突出问题，集中火力攻坚、逐个整改到位。保持高压态势，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

长管长治。抓好农村基层党建“一抓双促”和城市基层党建“三抓一增强”工程，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探索开展“党内政治监督谈话”，加强对“关键少数”教育管理监督。制定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正负面清单，推行事前分析研判和评估预防机制，探索建立精准识别、精准量纪、精准问责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做到“群众盼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始终与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好的初衷和好的效果统一起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接1版二条）

只有坚持一切依靠人民，才能有效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新时代新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牢固树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观念，不断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贯彻到党和国家所有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才能有力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协调行动、增强合力，确保中国发展的方向与定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仅不能丝毫削弱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而且对一切依靠人民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全面领导的力量从哪里来？归根到底来自于对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创造智慧的充分汲取；党的全面领导的权威怎样才能建立起来？归根到底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和真心拥护。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明确要求要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开展全面检视、靶向治疗，切实为基层减负，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新形势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种种表现和弊端，其中最严重也是最要害的，莫过于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甚至个别方面出现了一些自以为让领导满意而严重脱离人民的事情。现实问题深刻警示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牢记一切依靠人民的唯物史观，在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群众、真心实意依靠人民群众的基点上提升领导水平、树立领导权

生态价值，是指生态环境客体满足其需要和发展过程中的对于经济判断、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主体关系上的伦理判断，以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功能判断。

“生态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地球上任何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中都不仅实现着自身的生存利益，而且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价值）。第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及其个体的存在，对于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都发挥着作用，这是生态价值的另一种体现。第三，自然界系统整体的稳定平衡是人类存在（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对人类的生存具有“环境价值”。

生态价值是相对生命体来说的，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人类，但更多的是相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来说的。生态价值转化是经济学、社会学的生态诉求，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驱动；生态价值与人类需求之间的桥梁是生态产品转化，其分析逻辑是生态保护提升生态价值，转化生态产品，适应人类发展需求。生态系统是基础，生态价值是内涵，生态产品为人类提供服务，存在类、量、质三个维度。

生态价值同生态产品的关系是多维交互关系，不是一对一对应关系，同空间区位、价值观、社会需求、技术发展、管理水平密切相关。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生态产品需求不同。生态产品具有诸多特性如有形与无形、表层与深层、科学与人文、公共与私有、社会与经济、内部性与外部性、直接性和间接性等。无形产品如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宜人的气候等，在城市污染比较严重的时代这类产品成为时尚需求，成为休闲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但这类产品从生态价值利用层次来看属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表层产品，属于环境价值类产品，是公共社会产品。生态价值转化的深层产品是指利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开发生物科技产品，如基因产品、生物医药、生物芯片等，这是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未来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生态价值的不同载体可以转化为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发挥不同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森林生态产品、海洋生态产品、农田生态产品、公园生态产品等，从人类健康发展角度需要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平衡，既需要公园产品，也需要田园产品，更需要森林产品。生态价值转化为生态产品是有限度的，生态系统承载力是有极限的，要想持续发展，必须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生态价值具有产品

什么是生态价值

的复合性，通过生态价值的多重产品转化，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如农业景观价值的多重复合利用，一产、二产、三产的资源复合循环发展，农业生产和产品生产的同步性、同时性、同效性；又如科技园区自然系统同研发建筑空间的多重融合为科创人员提供了优质的生活、生产、研发环境，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科创园成为精神家园。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当前，不同程度存在的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农村环境问题依然是民心之痛、民生之患。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做起，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清 风）



威，确保党的全面领导的成效。

中国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

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之举。我国疫情防控 and 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完善治理体系，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弘扬中国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时代大任务和主旋律，需要继续坚持“一切依靠人民”这一真理和原则。

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国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本质体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有效，能否有效发挥推进社会发展、造福本国人民的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民群众接受与满意这一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中国社会、推进中国变革的长期实践中充分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的光辉结

晶。因而这一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获得人民认同和拥护，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从十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贯穿各项制度始终的就是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既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显著优势；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具有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这两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特有的本质和独特的优势，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制度优势。

一切依靠人民，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制度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更需要严格遵守和执行。而无论是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还是制度的遵守和执行，都离不开“人”这个核心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确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提出了十三个方面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总任务。实现这个总目标，完成这个总任务，需要从一系列方面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而最根本最关键的，就是要密切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入推进制度改革，不断补齐制度短板，切实解决好制度建设方面“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把一切依靠人民切实贯彻到各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完善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名誉院长）